



张居正吏治中的儒学（张学智）

(2006-11-2 14:12:14)

作者：张学智

虚寂之为病，苟不务实得于己，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，则曰致曲，曰求仁，亦岂得为无弊哉！”张居正主张虚寂为本，然后能感而遂通。但此虚寂是用功夫之后的实得，本体之虚寂与功夫之实得一而不二。他反对不用功夫的虚寂，斥之为大而无当，窒而不通。苟无实功，致曲求仁等孔门根本宗旨不过徒为名言概念而已。从这里看，张居正之实学，的确不止经世之学，也包括修身成德，但无论那个方面，皆主实心实事，不空言欺罔。

张居正与泰州后学耿定向交谊最厚，往来书信最多。不仅有政事上的叮嘱，且有学问心得上的交流。前者如万历七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。张居正致信时任福建巡抚的耿定向，嘱其“丈地亩，清浮粮，为闽人立经久计，须详审精核，不宜草草。各经委正官，朝覲毕，即促之赴任。”后者如万历七年耿定向致信张居正询问如何治理福建，张居正回书答复，就便讨论治术。张居正的答复是，福建素称难治，今无别法，不过就前任刘尧诲、庞尚鹏之措施踵美补漏。治术重在甄别士之流品而各用其长，“惟在试之而责其成功，毋循虚名，毋求高调，则行能别矣。”而张居正的改革被许多人攻击为只讲霸道，不讲王道；只讲利，不讲义时，张居正又向耿定向吐露心声，讲自己对王霸义利之辨的根本见解，可见二人交谊非浅。这最主要的是两人是同乡，论学上又比较投契。如张居正曾在一封给耿定向的复信中说：“别去倏经霜雪，同心之怀，良不可任。辱谕，谓比来涉事日深，知虚见空谈之无益，具见丈近日造诣精实处，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，正在于此。”此信作于嘉靖四十一年，张居正以虚寂之本心融通内外，成变化立万端的基本思想此时已经确立，且此后忙于政事，无暇深造，故此思想历数十年不变。而耿定向的思想则屡有变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居正在夺情遭弹劾后求治渐急，所推行之措施逐渐严苛。耿定向以友谊曾加以规劝，二人关系自此疏远。此情见于耿定向弟子焦竑所作之《耿天台先生行状》，当不为无据。

与张居正有关但非其友人的何心隐，是考察张居正明年政事宦情的一个重要人物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，从学于泰州学派的颜山农，与闻王艮立本之旨。在家乡聚徒讲学，间以讽议朝政。在张居正任职京师国子监时，何心隐就不满张居正，讥讽张居正身居太学，不知太学之道。后又买通道士蓝道行，以扶乩去严嵩。张居正对此不能不心动。万历六年左右，何心隐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，将入都倡言驱逐之。张居正微闻此语，讽地方官使捕治之。何心隐四处躲藏，终被湖广巡抚王之垣缉获，死于狱中。后连同同乡罗巽，并被诬为妖人曾光之同党。此事对士林震动极大，并成为张居正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的导火索。

万历七年正月，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。前已述，张居正学本崇实，提倡默修，实有诸己，不喜聚讲空谈。此意在万历五年致南京国子监祭酒屠羲英的长信中表露最为明显，信中说：“夫昔之为同志者，仆亦尝周旋其间，听其议论矣。然窥其微处，则皆以聚党贾誉，行径捷举。所称道德之说，虚而无当，庄子所谓‘其啞言者若哇’，佛氏所谓‘蛤蟆禅’耳。而其徒侣众盛，异趋为事。大者摇撼朝廷，爽乱名实，小者匿蔽丑秽，趋利逃名。嘉隆之间，深被其祸，今犹未殄。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。”认为讲学有名者，皆虚名无实之人，甚至督责学官严纠聚众讲学之风：“为提学宪臣，则必遵奉皇上勅谕以造士，而不敢失坠。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，以自蹈于复古之罪也。……仆愿今之学者，以足踏实地为功，以崇尚本实为行，以遵守成宪为准，以诚心顺上为忠。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，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。”对当时的讲学之风可谓深恶痛绝。加之当时有私敛民财以建书院者，甚至有改参将公廨为书院者，遂有毁书院之令。前述罗汝芳，本与张居正交游，其开罪于张居正甚且丢官，据说也与讲学有关：“万历五年进表，讲学于广慧寺，朝士多从之者，江陵恶焉。给事中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，潜住京师，遂勒令致仕。”

张居正之恶讲学，毁书院，论者多以为与他不喜王学有关。实际上嘉、隆以后王学迅速传播，王门弟子遍域中，特别是东南一带。明代进士以东南诸省为多，与张居正有关的官吏、学者，亦多是南人。以上张居正交游之人，多南省之士，张居正渐渍王学，亦不可免之事。上述他以心之虚寂灵明为体，以心之成变化、行鬼神，应用无方为实得，亦不与王学根本宗旨相悖。惟张居正为学，以《大学》之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亦必求心性之默体自得，要为不落于虚言为归。所以他不见得反对王学。他所交游者，亦多王门后学。而朱子学主格物致知，本较王学为实。加之朱子学

为当时科举功令,而有明一朝最重科举,最尊崇朱子,王学学者虽在个人心灵体验上宗阳明,但在科举考试中,在礼仪典制等一般言行规范上,仍不得不遵朱子学。除少数特立独行者外,亦不敢公开牴牾朱子。所以张居仁并不能截然归于王学或朱子学。王学与朱子学也难有截然分判之标准。说张居正以朱子学反对王学,恐不能遽然下此结论。说张居正以治平之学反对心性之学,庶乎近之。但在明代理学已烂熟,四书已家弦户诵的情况下,绝对不讲心性的纯粹治平之学恐亦无有。张居正之恶讲学,毁书院,恐怕更多地还是从统一士人思想,消除异端,不给讽议朝政以合适的场所,避免士人结成团体应和朝中党争,同时避免士人追逐虚名,结纳干请,培养注重实地功夫,真修实得,力戒虚浮的学风这些方面着想。

张居正的吏治与其儒学有关。张居正的悲剧结局,亦与由儒学起家的整个士人群体所造成的氛围和宦情有关。儒学在政治中的作用,在政治家个人人格形成和执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,在张居正和他相关的士人群体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。其中的义蕴,是耐人寻味的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